

高等学校教学用书

中国建筑簡史

第二册

中国近代建筑簡史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理論及历史研究室 中国建筑史編輯委員會編



中国工业出版社

高等學校教學用書



中國建築簡史

第二册

(中国近代建筑簡史)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史編輯委員會編
建築理論及歷史研究室

中国工业出版社

本书簡要叙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筑的发展及其特点。全书分別論述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概况、城市的变化及发展、新类型建筑的发展、建筑技术的发展、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革命根据地建筑等几方面的問題。

本书的编写是在1958—1960年全国各地建筑历史資料的普查基础上进行的。

本书由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論及历史研究室及有关高等学校組成的中国建筑史編輯委員會编写。前后参加中国近代建筑史编写工作的同志有：建筑科学研究院：王世仁、王紹周、黃祥焜；湖南大学：楊慎初；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侯幼彬；武汉城市建设学院：黃树业；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呂祖謙；同济大学：董鑑泓。除楊慎初同志外，其他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最后编写工作。

中 国 建 筑 簡 史

第 二 冊

中国近代建筑簡史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史編輯委員會編
建筑理論及历史研究室

*
中国工业出版社建筑图书編輯室編輯（北京佟麟閣路內10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佟麟閣路內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事業許可証出字第110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787×1092 1/16 · 印張12 · 插頁 7 · 字数180,000

1962年10月北京第一版 · 196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30 · 定价（10-7）1.90元

*
统一书号：K15165 · 871（建工-93）

目 录

中国近代建筑概論	1
第一章 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10
第一节 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16
第二节 旧城市的新变化	39
第二章 新类型建筑的发展	47
第一节 工业、企业建筑	50
第二节 行政、文化建筑	65
第三节 城市生活服务建筑	90
第四节 居住建筑	109
第三章 建筑技术的发展	133
第一节 新结构的发展及新材料的应用	134
第二节 近代施工技术	139
第三节 近代建筑材料工业	143
第四节 建筑技术力量	147
第四章 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	152
第一节 中国旧建筑形式的局部变化	155
第二节 外国建筑形式在中国的演变和影响	159
第三节 中国“民族形式”的探索	170
第四节 建筑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及影响	178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建筑	181
第一节 城鎮建設	182
第二节 建筑	188
續后記	195

中 国 近 代 建 筑 概 論

中国近代建筑活动从1840年鴉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一百多年間，經歷了一段十分曲折的发展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一方面，由于封建經濟結構的逐步解体，資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我国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建筑活动。这种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相联系，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相联系的新的建筑活动，与长期封建社会中的旧建筑活动比較起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残酷統治和压迫，由于中国經濟、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反映在近代建筑活动上，也呈現出各方面的复杂性，造成我国近代建筑发展中的許多混乱現象和畸形状态。

近百年的建筑绝大部分遺留到現在，成为解放后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最初的物质基础，并給我国新的建筑事业以最直接的影响。因此，探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中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认识在錯綜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大量地遺留至今的建筑的性质和特点，对于掌握近代建筑的发展規律，批判地继承近代建筑遗产，都有重要的理論意义和实际意義。

1840年鴉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一方面，落后的自然經濟結構保留着原来面目，另一方面，旧經濟結構內部已孕育着資本主义的萌芽。反映在建筑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建筑，到封建社会后期，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筑方式，但也突出地表現了在类型上、技术发展上的严重停滞和落后状态；只有一些手工业工場建筑，作为資本主义萌芽的反映，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如遺留至今的四川盐場建筑，規模已相当龐大，建造技术也相当复杂，有二、三十米高的井架，十几米高的視樓；煎盐的灶房多至二十九間，大的可容燒鍋六、七百口。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前后，由于葡萄牙侵略者侵占澳門，外国傳教士来华，对外貿易机构十三行的設立和圓明園內西洋樓的建成，在中国領土上，陸續出現了一些近代西式建筑。但数量很少，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1840年鴉片战争后，隨着社会性质的轉变，中国建筑开始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建筑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新的发展和变化，在近代历史中，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紀末，从1840年鴉片战争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前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要內容是：隨着封建經濟的解体，封建王朝的沒落，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旧的建筑活动总的走向了衰落；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資本主义的发生，产生了与中国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建筑活动及新建筑类型。

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旧建筑活动，在鴉片战争以后，在总的走向衰落的

趋势中，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还有某些建筑活动具有与其社会背景有关的特点。主要的有以下三方面：

1. 在外国侵略加深，封建经济解体的同时，农村破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终于在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到1864年止这一段时间，太平天国占领过六百多座城镇，建立了农民政权，开展了一些军事工程和王府的建筑活动。直接为农民革命战争服务的军事工程，由于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一般规模都很大，而且建造速度很快。王府建筑大多是“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彩画”，利用旧屋改建。其中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的壁画和新彩画。这是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而选择的一些简便有效的建筑艺术处理手法。由于太平天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不可能出现自成系统的、真正反映群众需要和意愿的建筑物。上述这些，只是表明农民政权对建筑的一些直接影响。

2. 封建地主阶级中出现的地方大军阀、大官僚的新势力，在镇压农民革命的基础上，随着疯狂掠夺和大量的土地兼并，湘、淮系军阀和蒙古王公等在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以至东北、内蒙等地，掀起了一个追求高、大、华丽的大住宅、大祠堂的建筑潮流。这个潮流并扩展到大地主、大商人中，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才逐渐衰退。在这些大住宅、大祠堂以及与之相结合的私家园林的建筑中，一方面，近代匠师在院落组织、空间分隔、楼房处理、交通安排、庭院绿化以及住宅与园林的结合、山池花木和小建筑的处理等方面，发展、丰富了一些传统的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当时官僚地主阶级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方式和追求炫耀、排场、浮夸等没落的精神面貌。建筑中往往表现了虚夸、堆砌，而且影响了商店、会馆等的繁琐装饰。

3. 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最后崩溃，结束了封建社会中帝王宫殿园林的建筑历史。河北最后几座清陵的修建和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的重建，成了封建皇室建筑的最后一批工程。

这些工程中，清陵规制比鸦片战争前显著缩小了；圆明园的修复只整修了极少数建筑；颐和园在1888年的第一次重修和以后在1903年的再次重修中，也只恢复了清漪园的一部分。这些，说明了清皇室的库府拮据、财力枯竭，反映了王朝穷途末路的崩溃景象。

所有这些，特别是和新建筑方式比较起来，反映了旧建筑方式在近代总的衰落趋势。

1842年的南京条约，为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侵入中国的大门。英国强占了香港，葡萄牙继续霸占了澳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被辟为通商港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据点从广州一口的有限开放而向北伸展，联成一条侵略线。上海很快成为对外贸易和列强经济侵略的中心。东南沿海一带，很快出现了第一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先后订立了天津、北京两条约，使通商口岸由沿海五口扩大为沿海七省和长江内部十三个商埠；由侵略者只在五口通商传教，扩大到随意到内地通商传教。

到1895年止，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侵略基地的商埠达到三十四处，不仅分布在沿海、长江两岸，而且出现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如甘肃、新疆、内蒙、西藏等地。香港、九龙和台湾的一些城市成了割让地，完全殖民地化。广州的沙面、厦门的鼓浪屿等成了侵略者的独占租界。而上海、天津、汉口等则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占领的半殖民地城市。

外国侵略者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据点，修建兵营；设立领事馆、工部局、监狱、捕房，施行殖民统治；开设洋行、商店、工厂，收集原料，推销商品；开办银行，控制金融，输出资本；修建码头、海关，垄断海河运输；建立教堂、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

并建造了满足居住和生活享受需要的高级住宅、饭店、俱乐部、跑马场等。

这些适应外国侵略需要的建筑，基本上都是西方近代建筑方式。到十九世纪末，大多是一、二层楼，砖木结构，“殖民式”和欧洲古典形式的建筑。

这批具有相当数量、包括多种建筑类型、反映着近代建筑技术水平的建筑，一方面是侵略者的侵略工具和享乐工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建筑活动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建筑的发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中国产生了微弱的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建立了一批封建性、买办性的军事工业。七十年代后，为了供应军事工业需要的原料，和被外資民用工业巨额利润的吸引，开始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业。经营方式也从官办转到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到八十年代中，大约办了十几个企业，如开平煤矿、兰州机器织呢局、上海织布局等。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先后创办了四、五十个企业，规模都很小。甲午战前，规模开始扩大，大小企业共创办了一百多个，其中包括缫丝、棉纺、火柴、面粉、碾米、造纸、印刷、采煤和机器制造、金属矿业等。

这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总的看来，力量还十分微弱。在建筑中的反映，主要是产生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工业建筑等新建筑类型。

此外，由于本时期新疆、东北农业的开发，大量的内地人口的迁徙以及七、八十年代新疆、甘肃、云南、贵州等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汉、回、维、苗、彝等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地区形成民族建筑的一些交流现象。如东北，这时期的建筑接受了关内建筑很深的影响。但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旧建筑方式的。

上述反映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建筑和被外国资本主义操纵的建筑，构成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新建筑。这些，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建筑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建筑类型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建筑技术开始新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建筑风格的变化，标志着中国近代建筑工人队伍在逐步形成。

二、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第二阶段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进一步发展时期。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以甲午战争为起点，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疯狂地展开了瓜分中国的活动。帝国主义列强除扩大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竞相加强对中国的投资，纷纷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作为外国对华输出资本的工具的银行迅速增多。中国铁路几乎全部被外資控制。1895—1898年短短三年多，英、俄、德、日、比、法、美在中国共掠夺了近九千公里的铁路建筑权。这些铁路修到那里，那里就成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样，北起黑龙江，南到两广、云南的广大地区，分别成为俄、德、日、英、法各自划定的“势力范围”。

表现在建筑上，这时期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服务的建筑，象银行、工厂、火车站等类型增多了。侵略者掠夺的腰包雄厚了，侵略势力加深了，反映在建筑上是规模扩大了。随

着中国建筑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現了五层以上的新式建筑，如上海的汇中飯店、理查飯店、先施公司，北京的六國飯店、北京飯店等。供侵略者穷奢极慾，生活享受的娱乐建筑，如上海的英國总会、法國总会、国际俱乐部、跑馬場、跑狗場等进行了重建或新建。許多高标准、高质量的独院式高級住宅也集中在这时期湧現。

以教会为中心的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本时期也更加深入、扩展了。十九世紀末，教堂和宣教点已遍布全国各省区的乡村和城市。屬天主教系統的大小教堂，仅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就有四千余处。

这些教会除了修建教堂外，还举办学校、医院、报館、育嬰堂等。1889年，基督教系統在中国設立医院有六十多处。到1920年，全国已經办了教会高等小学956个，中学291个，大学十余所。

这些教堂和教会建筑蔓延很广，深入到广大的城镇和农村。它們往往圈占大片地段，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尖頂的教堂形象，构成中国近代城乡中一个十分触目的景象。其中不少教会建筑也采用了中国宮殿形式，是侵略者用以掩盖侵略面目的手段。

甲午战后，國內自办的工业曾一度有較大的发展。資本主义經濟在国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大为增加。商办的輕工业和煤鐵采矿业有显著的发展。为了积累資金的需要，中国創办的第一个銀行中国通商銀行于1897年在上海开业，以后并在各地設分行、支行。反映在政治上，为了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权，新兴資产阶级選擇了改良主义道路。1898年出現了“戊戌政变”，把封建思想打开一个缺口。“維新运动”期間，各地普遍建立了学会，开办了不少学堂，学习、傳播西方自然科学和資产阶级的政治、經濟理論。

在国内革命斗争新的发展形势下，封建統治者不得不对民族資产阶级作一些让步。清政府在“新政”名义下，一方面强化国家机器，练兵筹款；一方面設立商部，奖励兴办企业；并改革了考試和教育制度，廢除八股、科举，令各省設立学堂；随后进一步制造“預备立宪”的騙局。1909年，各省相继成立了諮議局等机构。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治，虽沒有建立名符其实的資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使資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所提高。一些法律、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于是国内工业建設又一度有了較大的发展。各地工业建設会、实业协会以及国貨維持会等团体都紛紛成立。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又給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造成了一個有利的机会。

辛亥革命后反帝斗争大大高漲。抵制外貨、发展实业以及实业救国等口号成了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羣众性的爱国斗争有力地支援了民族工业对日本新的經濟侵略的抵抗，促进了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

这样，中国資本主义又得到一度較大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过去，時間延續較长，而且方面也較广。1912—1919年八年間的厂矿建設，超过了过去五十年。华資銀行从1911年的十五家增加到1919年的六十多家。近代工业的布分地区起了变化，1911年前，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沿江少数几个通商口岸，到1919年，除边远地区外，内地各省差不多都有十数个、数十个近代厂矿建立。南通、无錫、济南等城市新的工业区也在这时期兴起。

由于上述中国資本主义經濟形态、政治力量和思想意識的发展，中国資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現与成长，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大大促进了中国資本主义

性质建筑的发展。加上本时期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大批建筑活动，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新建筑方式。

首先，中国近代建筑的类型大大丰富了。到这时止，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物的近代工业厂房、仓库、码头、火车站、银行、洋行、海关、邮电局；有了为资本主义商业活动服务的大百货公司、大商场、劝业场、劝业会场；有了反映资本主义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国会、谘议局、学堂以及行政办公用房；有了适应城市上层社会生活和普通市民需要的大旅馆、大酒店、影剧院、游乐场等等。在居住建筑方面，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集中、城市地价的上涨和房产地产的商品化，出现了居住大院、里弄住宅和行列式的工人住宅区；并且增多了服务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需要的新式高级住宅。

其次，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显著进步，提供了近代建筑技术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本时期新类型建筑的建造中，开始有了近代多层楼房和大跨度的车间、厅堂；有了较多的钢结构，并开始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有了较完善的近代卫生、电气设备和少量的施工机械等。

在建筑新功能、新材料、新结构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近代新建筑形式，其中反映着社会上不同思想意识的影响。

最后，十分重要的，在这些新建筑的建造中，成长了早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工人队伍。他们迅速地掌握了近代先进建筑技术，在外国侵略者、封建把头和资本主义剥削几重压迫下，艰苦地创造了中国近代建筑的物质财富。

三、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这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形势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924年组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各地群众革命运动获得很大发展。汉口、九江收复了英租界。湖南等十五个省分出现了农民协会组织，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政局处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各派军阀混战的局面中。这些封建军阀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又各自代表国内各派买办豪绅势力的利益。在军阀混战和革命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这些军阀、买办、地主、豪绅们往往向上海、北京、天津以及各省会城市迁移。他们大量地在租界内投资进行商业活动，经营房地产业，修建私人住宅。这些建筑活动是造成一些城市，特别是租界区的畸形发展的一个因素。

1922年前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行加强，使曾经一度迅速发展的民族工业又遭到挫折而陷于停滞和危机状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作为帝国主义势力标志的海关、银行、巡捕房等在二十年代进行了扩建和改建。如上海的海关，最早是1857年建的两层砖木结构的传统衙门式建筑，1891年改建成三层砖木结构的英国式建筑，到1925年重建成了八层钢架结构的西方古典式的大厦。其它象上海、天津的汇丰银行，汉口、广州的海关大厦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取得美英帝国主义的大量援助和上海、江浙金融财阀

的支持，作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新工具，建立了反革命军事专政，施行黑暗的法西斯统治。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袭击下，在民族危机深重的灾难中，蒋介石发动了連續不断的十年内战。它給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浩劫，带来了千百种苛捐杂税，加以水旱天灾，造成了連續不断严重的饥荒。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巨浪打击着半殖民地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彻底破产，工商业大量停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以及买办官僚集团却在人民貧困化的基礎上，攫取了大量財富，形成了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壟斷資本，形成了官僚資产阶级。

正是在上述軍閥、地主向租界聚集，帝国主义加深在中国的侵略和官僚資本的壟斷作用下，出現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統治区大城市的畸形扩展。出現了以上海、南京等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建筑活动的畸形发展。

1931年，日本发动了霸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淪为殖民地。內蒙和华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也处在日本侵略势力的控制之下。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經控制了东北的軍事、政治、工业和交通，而且通过关东軍參謀部和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支配着东北城市的规划和建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作为侵略基地。沈阳、长春、哈尔滨、鞍山、牡丹江等，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总侵略計劃的一个組成部分，进行了城市规划，在1932—1937年間，进行了頻繁的建筑活动。主要建筑类型是軍事基地、工业厂房、伪滿統治机构、金融企业机构、商业建筑以及侵略者的生活用房等。

在国民党統治区城市和建筑的这种畸形发展过程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的这种頻繁建筑活动中，一些建筑的規模扩大了。广州、天津、汉口和东北的一些城市中，陸續建造了八、九层的建筑。特別是上海，这时期出現了二十八座十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建筑类型方面也起了变化。在东北，工业厂房的类型有較大的发展。作为世界交易場所和“冒險家的乐园”的上海，成了國內外反动阶级和大資产阶级的集中地。銀行、出租写字間的大楼、高級飯店、高层公寓、別墅住宅、影剧院、舞厅、俱乐部等成了主要的建筑类型。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中心的南京，主要建筑活动是反动政权的行政机构、軍宪特务机构、經濟壟斷机构的房屋和一些官僚的高級住宅等。

在这些工业厂房、高层、大型和高质量的建筑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联系，建筑技术水平有很大的进步。最高的高层建筑达到二十四层。許多复杂的工程都达到了較高的施工质量。建筑裝飾水平和設备水平更有很大提高。

中国近代建筑工人的队伍得到了壮大。上海一地就出現了数百个营造厂。由于中国近代建筑师、工程师的成长，开始改变了早先建筑設計业务被外国洋行絕對控制的状况。

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也在本时期呈現复杂的变化。形成所謂近代式、“宮殿式”、“混合式”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中的“复兴式”、“兴亚式”等种种建筑形式。

192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領導下，在井崗山建立了第一个大片革命根据地。1929—1930年間，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西、广东、河南等省境內，先后建立了大小十五个革命根据地。1931年，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5年，經過长征，轉移到陝甘宁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人民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陣地。在这些

陣地上，广大农民羣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下，热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經濟基础上，在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領導下，进行了一些建筑活动，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真正为人民所掌握的建筑事业的新历史。

当时革命政权遭受蒋介石的殘酷“圍剿”和經濟封鎖，除个别工程外，一般不可能建造过多的新建筑。但从革命政权所执行的沒收軍閥、地主、豪紳的祠堂、庙宇和多余住宅，分配給革命机关和劳动人民使用，在劳动法中規定对工人居住問題的关怀以及革命羣众热情地投入紀念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建造活动中，展示了极其可貴的革命建筑事业的新方向。

四、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第四阶段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处于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筑活动較少。

抗日战争期間，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掠夺和瘋狂破坏；另一方面是四大家族凭借政治地位，利用抗战名义，控制一切經濟命脈，濫发紙币，橫征暴歛。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反动統治中心轉移到西南，隨之一部分沿海城市的工业向内地迁移。由于内地各省原来工业很少，加上淪陷区人口的流入，沿海地区某些进口物資的断絕和战时物資供应的需要，在1942年前，四川、云南、湖南、广西、陝西、甘肃等内地省分的工业有了一些发展。近代建筑活动开始較多地扩展到这些内地的偏僻小县鎮。

这时期国民党統治区的建筑，除少数供統治阶级使用的建筑外，一般都是临时性工程，大多采用竹、木、土等地方性建筑材料。

日本帝国主义在“七七”事变后，企图以东北作为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后方”和进攻苏联的基地，对东北經濟的控制和掠夺更加加强了。在軍事工业和为軍事工业服务的原料、燃料动力工业方面，如飛机制造、汽車制造、鋼鐵、采煤、石油、电力等，有了較大的扩展。重工业建筑在类型和規模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企图取代日本帝国主义，从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全面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美帝侵略势力籠罩下，国民党統治区内渗透着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其腐朽的精神文化的影响。战后的建筑思潮和建筑教育也受到美国建筑潮流的侵蝕。只是由于当时建筑活动不多，在实践中还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抗日战争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从日伪軍和蒋介石反动派两方面的残酷进攻和經濟封鎖，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全体軍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开垦荒区发展农副业、手工业的生产中，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建筑活动，产生了象著名的軍垦区南泥湾那样的新型居民点。

在解放战争中，党制訂了防止破坏城市的措施。在地下党領導下，开展了护厂、护校的斗争，保护了城市的物质財富和文化古迹。許多城市在解放后，立即进行了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調整住宅等工作。所有这些，体现了党对建筑事业的关怀，体现了人民建筑事业的嶄新方向。

*

*

*

从上述中国近代建筑經歷的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中国封建社会中发展形成的旧建筑方式在近代还在延续。在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由于依然保持着封建剥削关系的经济基础；由于近百年广大人民的极端贫困化，旧营造方法和匠师的手工劳动仍然是建筑技术主要依靠的条件，民间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停滞状态；封建帝王贵族的宫殿、陵园建筑活动，则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崩溃，而走向衰落并最后终结。这些，构成了旧建筑方式在近代总的衰落趋势。

以南京条约为起点的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侵略，在中国的近代城市中，出现了殖民地性质和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在中国的近代建筑活动中，出现了为外国侵略者所操纵的、分布面很广、类型繁多、规模相当大的建筑。这些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在侵略者操纵下，这批建筑作为侵略者的侵略工具和享乐工具，功能处理上反映着侵略者的某些侵略意图和腐朽的精神面貌；造型上以形形色色的建筑形式影响中国城市面貌的统一，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风格的紊乱。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磨灭我国民族意识的作用。这些，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尖锐的民族矛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些建筑从类型来看，包括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各种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从技术来看，它反映了新技术的发展水平，较为普遍地采用了近代的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和一些新的施工技术。从建筑形式来看，在形形色色建筑形式中，包含着适应近代建筑功能要求和技术条件的处理建筑造型的一些基本手法。所有这些表明，近代建筑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是社会生产力新的发展的反映。

这些建筑是侵略者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财富，在奴役中国人民的劳动下建造起来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正是中国匠师和由城乡劳动者转化过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工人建造了它。它是中国近代建筑工人用自己的双手，通过学习和迅速掌握近代先进建筑技术成就所创造的。

中国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复杂的、曲折的，但它仍然给了中国近代建筑以巨大的影响。它决定了对近代建筑内容的基本要求，也提供了近代建筑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近代建筑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除了基本上形成近代的工业和民用建筑的新类型外，还有了薄弱的近代建筑材料工业；有了一些近代结构形式和施工机械；建立了营造厂和设计事务所等施工、设计组织；形成了拥有大批近代建筑工人和数量不多的建筑师、工程师的建筑队伍；开始培养建筑专业人才，进行了一些建筑学术活动。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性质建筑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地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压迫和摧残，力量非常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统治力量。因此，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建筑活动也是十分薄弱的。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中，存在着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旧建筑方式的延续、变化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建筑方式的形成、发展，造成两种建筑方式并存和互相影响渗透的局面。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反映在建筑中的必然结果。从建筑的绝对数量来看，旧建筑活动仍然居于优势。从近代建筑发展的性质、意义和深远影响来看，新建筑方式则占有无可疑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当时建

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它是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要求和必然趋势。因此，它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方面。

建筑技术力量在近代起了巨大变化。除了大部分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仍然保持着匠师、农民、手工业者的建筑生产队伍外，大量的新类型建筑的施工、设计则由近代建筑工人和近代建筑师、工程师所取代。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經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經濟体系的附庸一样，中国近代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建筑思潮的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建筑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近代建筑的设计实践、创作思想和建筑教育。

经历了短短一百零九年的中国近代建筑，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建筑比較起来，是个十分短暫的发展阶段。但这却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史向我們展示了中国建筑从封建社会的古代建筑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建筑的演变过程；向我們展示了在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近代建筑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复杂关系；向我們展示了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建筑活动及近代新式建筑物成长經過及其特点；向我們展示了近代建筑发展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史还向我們展示了在革命根据地中，人民建筑事业新生的萌芽。

第一章 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鴉片戰爭前，中国的一般城市，包括封建都城、地区封建統治中心的省城、州城、府城、一般县城、工商业城镇，以及少数已受西方資本主义影响的城市。其規模虽然不同，形式有異，但基本上都是长期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发展是很緩慢的。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封建社会迅速解体，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是社會經濟的直接产物，这种剧烈的变化，必然使原有的封建城市发生不同性质与不同形式的分化和发展。

这时期城市基本上分化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城市是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或由于本国資本主义工矿交通企业发展較快而产生极大变化或新兴起的城市。这类城市較多地反映着新兴資本主义經濟特点。

这一类城市有的长期在某一个帝国主义控制下，如哈爾濱（帝俄）、旅大（帝俄及日本）、青島（德国和日本）、广州湾（法国）等；有的长期被帝国主义占領，如澳門（葡萄牙）、香港（英國）及日本帝国主义占領下的台湾、东北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有明确的建設意图，具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城市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間的矛盾。在城市分区及公用管綫設施方面都有强烈的对比。

有的城市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下，有特殊的租界地，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它們都是中国原来的最大的工商业及交通中心。这些城市中租界与中国旧城有强烈对比。相隔咫尺，有天地之別。各国租界之間壁垒森严，各自为政。道路及公用管綫混乱而互不联系。租界各自畸形发展，整个城市布局及建筑面貌极为混乱，使整个城市成为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建筑形式杂乱无章的陈列所。

由中国官僚資本或民族資本开办的一些新的工矿企业，也促使了一些新城市的产生，如河北的唐山、河南的焦作、湖南的錫矿山、湖北的大冶以及抗战时期的玉門等城市。由于現代化的交通，特別是鉄路，对工商业及城市发展影响很大，因此在鉄路樞紐或鉄路与重要河道的交点处的城市获得較快的发展，如郑州、徐州、石家庄、蚌埠、浦口等，以及抗战时期的宝鸡、双石鋪等。

第二类城市是原来的封建城市，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及本国資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发生局部的变化，但基本上仍是旧的城市。

这类城市包括封建都城北京和一些长期作为地区封建統治中心的省会而在本时期也有一定变化的城市，如西安、成都、太原、长沙、南昌、兰州等。

有些城市由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变化較大，在內地的如江苏的南通、无錫，四川的自貢、內江等，但基本上仍屬旧城的类型。在沿江及沿海的城市，往往辟为商埠或設有租界。这些租界、商埠地一般位于旧城近旁，形成畸形繁荣的商业区，与旧城的布局及面貌完全不同。这类城市如南京、济南、沈阳、宁波、福州、蕪湖、九江、重庆、万县、烟台、錦州、营口等。

有些城市原为傳統的手工业、商业中心，或位于交通要道，由于其它城市資本主义工

商业发展，或由于新的现代化交通出現，取代了这些城市的地位，因而相对地衰落。如大运河沿綫的一些城市，山东的临清，江苏的淮阴、淮安、揚州，上海附近的浏河、嘉定，浙江的南潯等。

广大内地城镇，因为經濟基础沒有显著变化，因而变化甚微或根本没有变化。

近代城市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經濟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按其发展特点，約可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一)由十九世紀中叶到十九世紀末叶

鴉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签定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使英帝国主义霸占香港，并开放南京、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其后不久又在“虎門條約”中被迫同意开放“外人居留地”，这就使中国土地上开始出現大量的“租界”，使一些城市畸形地发展起来。其中以上海、天津最为突出。有些城市如北京虽无租界，但在1858年按照“天津條約”在城市設“使館区”，对城市的变化也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虽然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但由于是战争时期，而且政权建立較短，对城市建設的影响不大。

封建統治阶级內部的“洋务派”为了鎮压农民起义，借用資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开办了一些軍事工业。由1865年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天津、武汉也有工厂設立。为軍事工业服务的民用工业也随之兴起，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織布局等。八十年代，也有部分資本家在上海、武汉等处开办小型工业。这些，对一些城市的发展也有影响。

(二)由十九世紀末叶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

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失敗，清政府被迫签定“馬关條約”。其中規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國設工厂。这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的經濟侵略已开始由商品輸出进入資本輸出阶段。一些租界城市由于大量設工厂，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天津原先只有英、法、美租界，1900年后德国也在天津占有租界，其后不久俄、奥、意、比四国又在天津占租界。到此天津共有八国租界，城市范围扩大好几倍。

中日战争及其后不久的“八国联軍”侵略，使清朝腐朽衰敗的实质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扩大侵略活动，开始划分势力范围，建立侵略基地，因而产生了一批帝国主义独占的城市。1898年德帝国主义强占青島，同年帝俄强占大連及旅順，其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取帝俄而代之，到1915年大連市区已扩至14.25平方公里。哈尔滨也于1896年按“中俄密約”以“铁路附屬地”的形式为帝俄强占，建立工厂、車站及南崗区的大片住宅区。

这一时期沿海大部分大中城市，甚至内地的一些城市，如万县、宜昌、沙市、箇旧、伊犁等地也都开辟为商埠，有的还設有租界。

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沒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封建軍閥的割据代替了清王朝，連年的战争，使城市遭受严重破坏，談不上任何建設。一些軍閥、官僚、政客、封建大地主紛紛向租界集中，促使租界畸形发展。

(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中国民族資本即已开始有較快的发展，但以1914—1918年

大战期间及以后的几年最快。这种情况以江浙地区较为显著。例如无锡在这一时期就开办了許多民族資本的面粉、紡織、絲綢等工业，使城市发展很快，甚至在1922年制定过商埠计划，1929年打算設市。上海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租界及非租界地区均有較大的扩展。从1914年至1921年間，上海华商建立的工商业竟超过1913年以前总数的一倍。上海附近除了无锡外，苏州、常州、杭州、南通等地均有一定发展。又以青岛为例，这一时期也建了华商的华新紗厂及其他一些面粉、火柴、酿酒、打蛋等厂；商业貿易也有較大的发展。隨之人口增加，市区有所扩大。

(四)二十年代末到抗日战争以前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勾結帝国主义及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建立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

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政治中心南京、广州，經濟中心上海在此时有了畸形发展。

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卖国投降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竟占领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东北做为他們侵占全中国的基地，建設了伪滿洲国的政治及軍事中心长春，工业中心沈阳、哈尔滨，掠夺东北資源的港口大连，軍事基地牡丹江、旅順，扩建了鋼煤中心鞍山及撫順，把这些城市变成了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日本占领者居住在城市中最好的地段；中国劳动人民被强迫一再搬迁到最恶劣的地区。在一些接近抗日根据地的地区則实行“併屯”，制造无人区。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紅軍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紅都瑞金也进行了不少建設。由于敌人的包围及进攻，这些建設工作不可能大规模进行，但从其为人民所占有，为人民服务等方面，已可以看出与反动派的建設有着本质不同的新的方向。

(五)抗战期間至解放前夕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侵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的大中城市。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向西南及西北地区撤退。为了保存財产，将沿海部分工业内迁。内迁初期，这一暫时的刺激因素，使西南、西北原先的一些偏僻城市受到一些影响。如湖南衡阳，曾一度由十万人增至五十万人，湘西沅陵、辰谿、芷江等偏僻县城也因工业及人口增加而有些发展。

軍事工业及軍事資源的开采，也使一些城市扩展或新建，例如兵工厂較多的四川泸州、开采油矿的甘肃玉門。

由于軍事的需要，修建了西北、西南两个地区的新公路，使沿綫一些原先的偏僻小城也繁荣起来，如甘肃的天水，陝西的宝鸡、双石鋪，宁夏的銀川，四川的广元，云南的騰冲等地。这些新发展的市鎮多在汽車站附近。

上述这些城市的发展因素多是暫时的，抗战胜利后就又衰落下来。

重庆由于是反动政权的“陪都”，其政治、軍事、文化、特务机构都集中这里，内迁工业也較多，因而抗战时期有很大的发展。战前只有28万人，抗战开始后不久增至47万人，1945年抗战胜利前竟达100万人以上。1940年的市区面积由1933年的93.5平方公里增为300平方公里。工厂增至1500家，为战前的十六倍，占当时国民党統治区工厂的30%。这些工厂多集中在小龙坎、彈子石、海棠溪一带。

国民党大官僚在市內到处建別墅住宅。蔣介石一人在山洞、九龙坡、南溫泉等地就建有六、七处之多。而一般人民則仍住在竹架、泥牆草頂的临时房屋中。

抗战胜利后，重庆的暫时“繁华”大为減色。这时也曾搞了一个“陪都十年建設計劃”。

日占区除了扩建掠夺战略資源的塘沽新港及大冶黃石港外，广大城鎮則遭受严重破坏。

革命根据地中以延安为代表，虽然处在反动派的严密包围下，又不断受到日机轰炸，但在民主政府与人民通力合作下，自力更生地进行了一些建設工作。1942年制定了城市建設計劃，修建了一些新村，开辟市場等。解放早的城市，认真执行城市政策，为发展及恢复生产創造了条件。并着手改变一些旧城市的不合理的現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統治区的城市根本談不上什么建設工作。反动派依靠美帝支持，发动反人民的內战，对城市大量破坏：拆毀民房、砍伐树木、甚至狂炸千年名城开封。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城市才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及时提出了“为工业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設方針，开始了恢复工作，彻底改造反动政权留下来的破烂摊子。

* * *

近百年来，城市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 城市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

这一时期虽然不少城市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性质，发展的地区极不平衡；只有沿海的一些城市有較大的发展与变化，而广大内地，特別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則依然处于落后的状况。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更加深了城乡間的对立。一些大城市的畸形发展是建立在广大农村破产的基础上的。大量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以上海为例，搬运工人及人力車工人几乎绝大部分来自苏北灾区。少数大城市的“繁荣”与广大农村的凋零破产造成强烈的对比。

2.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城市中的反映

中国近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勢力和官僚資产阶级与中国人民之間的矛盾。这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必然会在城市的发展中反映出来。

民族矛盾首先反映在城市分区上。北京有使館区，筑有高牆厚壘。广州沙面，厦门鼓浪屿以深水环隔。青島的德国人居住区，大連的欧罗巴区，哈尔滨的南崗区，都是帝国主义独占的禁地。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租界或铁路附屬地也是帝国主义所霸占。这些地区皆位于城市中地势高爽、交通便利、风景优美的地段，而中国人民則住在条件最差的地区。其次，反映在用地规划及建筑标准上。帝国主义霸占的区域内，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很低；中国区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区内則恰恰相反。以青島1902年統計資料看，德国区人口密度仅19.1人/公頃，中国区大鮑島附近人口密度达417人/公頃；德国区多独院型花园住宅，建筑密度不过20—25%，中国区建筑密度（净密度）高达75%以上。再次，反映在市政設施上，以青島为例，德国区内綠化面积占全市的72.55%，平均每人17.82平方米，而中国人居住的台西区平均每人只有0.01平方米，相差之悬殊，至为惊人。其他市政設施也莫不如此，如青島用水标准，欧美人600公升/人日；而中国人只90公升/人日。